

中东精英如何认知土耳其外交？*

[土耳其] 萨瓦斯·根奇 [土耳其] 法提赫·阿吉

内容提要 2014年，土耳其法提赫大学在中东9个国家做了题为“中东精英的土耳其观”的问卷调查。对于“如何认知土耳其外交”这一议题，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阿拉伯觉醒”发生后，土耳其外交政策已然发生明显变化，其对外政策超出了自身能力；土耳其虽仍属中东地区大国，但威望有所下降；在对待伊斯兰极端组织问题上，土耳其并没有采取支持的态度；土耳其在解决叙利亚危机方面，应扮演调停的角色；面对变局后的埃及，土耳其宜密切与之发展合作关系。基于近几年土耳其所遇到的地区外交挫折，土耳其政府应采用新外交理念，调整对外政策，方能拓展其外交空间。

关键词 舆情 “阿拉伯觉醒” 土耳其 对外政策 中东精英

作者简介 萨瓦斯·根奇 (Savas Genc)，土耳其法提赫大学 (Fatih University) 国际关系系教授；法提赫·阿吉 (Fatih Agil)，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博士生 (北京 100871)。

导 言

土耳其经济主要以出口和旅游为依托，而在图尔古特·厄扎尔^① (Turgut Özal) 时期，土耳其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在外交方面也尝试做出了一些改变。拉近与阿拉伯国家的距离、加强与中亚地区国家的联系、申请加

* 本文对中东变局的性质 (如“阿拉伯觉醒”) 和土耳其政治与外交的相关观点，仅代表作者的个人学术观点。——编者

① 图尔古特·厄扎尔曾任土耳其总理 (1983~1989年) 和第八任总统 (1989~1993年)。

入欧盟等，都是厄扎尔总统迈出的勇敢步伐。在此举措下，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视野得到了扩展，其国际角色与地位也得到了提升。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之时，安卡拉政府又将注意力聚焦于应对“二·二八”军事政变^①，在内政上采取针对异见人士的抓捕行动，而在外交上选择了与以色列进行战略合作。

在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英文缩写为“AKP”）执政的前两个任期，土耳其在外交方面提到和出台过一些具有土耳其特色的新概念和让人激动的新政策，如“与邻国零问题”、“与其他国相互免签政策”、“软实力”、“模式国家”、“多边外交”、“建立秩序的国家”等。然而，自“阿拉伯觉醒”^②以来，土耳其并没有完全把握好该运动的趋势以及阿拉伯国家的需求，同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潜力的边界。因此，不久前还在支持阿拉伯国家举行集会的安卡拉政府，如今却连向那些国家派遣大使都不能实现。“阿拉伯觉醒”发生后，土耳其对该运动不仅做出了错误的预测，还在外交上突出了理想主义与地缘文化。土耳其的这种外交政策在令人失望的“阿拉伯觉醒”后，面临着外交方向模糊的危机。在中东地区发生“阿拉伯觉醒”和其他问题之前，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重要国家，但地区形势的变化以及对该地区所推行的失当政策，导致土耳其失去了该地区主导性国家的身份。

正发党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两个时期进行分析：在“阿拉伯觉醒”之前，土耳其与邻国关系的问题解决得很好，不但可以互免签证，而且安卡拉政府申请加入欧盟的行动也在积极进行。然而，当人们开始进行大规模街头抗议之时，土耳其却放弃了原有的政策，试图变成穆斯林兄弟们挺身而出的“带头大哥”，还在外交中凸显“新奥斯曼帝国”思想。以前在周边国家扮演调解员的角色，能和伊朗、以色列和叙利亚同时进行对话的土耳其，却在突尼斯政变发生后，放弃了平和而有控制的外交政策，中心国家的思想在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中开始展现。在与以色列

^① “二·二八”军事政变指在1997年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军方发出军事备忘录，最后间接地推翻奉行伊斯兰主义的民选政府，但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推翻国会或废除国家宪法。土耳其军方出动20辆坦克、15辆装甲车，在事先聚集的大量电视、摄影记者面前展示了军队捍卫政教分离原则的决心。在军方的强大压力下，宗教色彩浓厚的总理埃尔巴坎（Erbakan）最后不得不在当年6月18日辞去职务。此举被一名土耳其海军大将视为“后现代政变”。

^② “阿拉伯觉醒”指2010年年底至今在中东发生的一系列打着民主旗号的政变，包括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等国的政治变局。这一系列变化也被称为“阿拉伯之春”或“阿拉伯革命”，为与调查原文保持一致，本文统一采用“阿拉伯觉醒”的表述。

列的冲突中，中东国家的人们举着埃尔多安的大照片，在游行过程中发生摩擦，其中尤以马尔马拉号事件^①最有代表性。土耳其国民在国际上的地位受到打击，巴沙尔政府毫无征兆地将土耳其飞机击落，两名飞行员身亡。紧接着，在雷伊汉勒（Reyhanli）镇^②发生的爆炸袭击，开始使安卡拉试图成为中东地区拯救者的想法落空。以戏谑埃尔多安和土耳其为主题的漫画开始在阿拉伯媒体上刊载，伴随着突尼斯变局的发生，埃及也发生了政权更迭。

正如 20 世纪 90 年代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热衷于建造“新奥斯曼帝国”的思想却又被迫在短时间内收回了一样，埃尔多安也在中东地区经历了一次惨痛的教训。在访问日本的过程中，埃尔多安曾说：“毫无疑问，土耳其没有主张成为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国家”^③。如果考虑这句话背后的深层含义，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相关政策倒退的迹象。在土耳其的周边，除了希腊、保加利亚和伊朗以外，其他国家诸如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有矛盾，而乌克兰、格鲁吉亚、伊拉克、叙利亚甚至塞浦路斯或者自身已经分裂，或者存在严重冲突。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大区域合作式的国家、形成大联邦制国家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中东的政治形势，甚至还为土耳其的政治安全问题带来了隐患。

与土耳其对外政策相关的人士已经就“土耳其对外政策有明显变化”这一论题达成一致，同时也重新开始讨论土耳其对外政策的“真正目标”。在这些讨论当中，不仅有关于“阿拉伯觉醒”中土耳其进行的比较平衡与积极的对外政策的观点，还有随着“阿拉伯觉醒”安卡拉超出自身的能力制定对外政策目标的观点。与此同时，土耳其本土有关学者和决策者却对此言之甚少。土耳其外交将许多时间花费在中东地区，而该地区的精英又如何关注土耳其，如何通过对外政策来评定土耳其的选择呢？对“阿拉伯觉醒”过程中的埃及政变与叙利亚问题而言，中东精英认为土耳其扮演了何种角色，他们又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

法提赫大学（Fatih University）国际关系与伊斯坦布尔研究院（Istanbul

① “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指在 2010 年 5 月 28 日，由土耳其的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Humanitarian Relief Foundation）领导的一支民间船队在蓝色马尔马拉号（Mavi Marmara）引导下试图打破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提供人道援助。5 月 31 日，以色列军队在国际水域拦截了土耳其船队后，以色列军队对马尔马拉号上的船员进行袭击，造成 8 名土耳其人和一名土耳其裔美国人的死亡，导致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② 雷伊汉勒镇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地中海沿岸，毗邻与叙利亚接壤的边界。

③ 这是 2014 年 2 月 7 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日本过程中回答记者问题时提出的说法，see “Erdoğan: Küresel güç olma hedefimiz yok!”, <http://www.dunyabulteni.net/haberler/285518/erdogan-kuresel-guc-olma-hedefimiz-yok>, 2015-04-25。

Institute) 从“中东精英对土耳其对外政策有什么看法”这一问题出发，决定进行针对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实际调查，该调查的目标是试图给决策者与政治学家提供可参考的数据。本次调查没有把普通老百姓作为调查对象，而是把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决策过程的人物选择为调查对象。这些人群的教育水平、经济能力与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为精英。考虑到调查的效果，该研究选择了面对面调查方式。在法提赫大学的资金支持下，通过在巴勒斯坦、摩洛哥、以色列、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突尼斯和伊朗做的调查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也是有趣的结果。精英调查与一般的舆论调查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能够在精英中得到 30 至 100 人的调查样本，就可以得到良好结果。在调查中，除了伊朗，在每个国家大约收集了 50 份问卷调查，总共有 500 多位中东国家的学者、媒体人、商人和作家参与完成了问卷调查。分析调查的结果后得出了对土耳其和区域内国家发展方向的一些分析。有关参加调查对象的细节，调查者分别根据行业、人口或民族的区别，附于调查报告中。^①

中东国家精英如何看待土耳其对外政策？

在有关调查结果与公众舆论的这份报告里，我们试图调查土耳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和中东国家精英对土耳其的认知。有关中东国家如何看待土耳其所主张的地区性国家的口号，这对于土耳其学者和对外关系的决策者有很大帮助。按照惯例，我们还将 2014 年的研究结果同前一年的进行比较，以提供更多的思考和帮助。在研究当中，与 2013 年比较最突出、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像国内有关土耳其对外政策的争论一样，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变化。针对“土耳其在国际政治中是否增加了自己的话语权”这个问题，有 73.4% 的人回答了“是”，表明中东国家的精英们在国际政治中还是把土耳其看作很重要的国家之一。但对于同样的问题，在 2013 年的受访者有高达 85% 的人回答了“是”。这说明，虽然土耳其在中东精英眼里是重要的地区国家，但对中东“精英”的吸引力却没有达到 2013 年的水平。

^① “How Middle Eastern Elites Perceiv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2014)”,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viewed people, <http://ir.fatih.edu.tr/?project1>, 2015-04-25.

(一) 土耳其对外政策的目标超出自身的能力

在“土耳其是否采取了超出自身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对外政策”这个问题上(参见图1),49%受访者的答案是肯定的,2013年同样选项的受访者人数比例则是45%。中东地区的受访者用不成功来定义“阿拉伯觉醒”时期的土耳其外交政策。并且,他们趋向于认为土耳其制定的对外政策目标没有太高成功率,这是因为:无论是叙利亚危机,还是埃及和伊拉克动乱,都波及土耳其,且对土耳其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仅有27.5%的受访者认为,土耳其对外政策与其能力是相匹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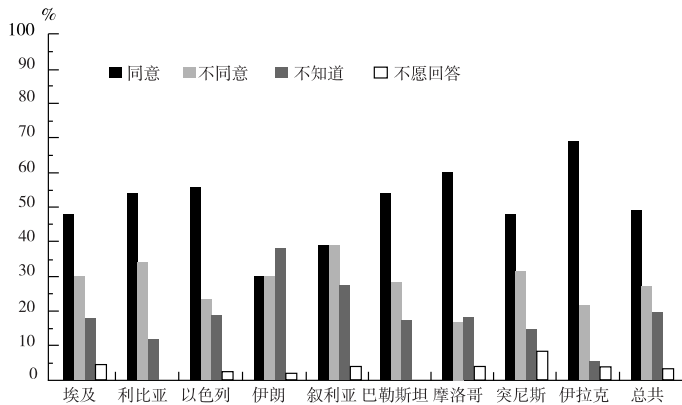


图1 土耳其是否采取了超出自身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对外政策?

资料来源:“How Middle Eastern Elites Perceiv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2014)”,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viewed people, <http://ir.fatih.edu.tr/?project1>, 2015-04-25.

(二) 中东民众对土耳其的同情日益减少

对于“如果将与贵国的关系程度由好至差(即第一至第五)分别排名,您把土耳其排在第几位”的问题,2013年受访者答案是“1”的人数比例为18%,而2014年的比例仅为8%;答案是“2”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了11.6%。根据受访者的描述,土耳其与受访者所在国家的关系,正是从2013年开始走向下坡路的,其中尤以阿拉伯人对土耳其的同情度最少。从这个问题研究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土耳其的邻国在提及地区大国时,排在第一位的国家不再是土耳其。而2013年的受访者中,32%的人都认可土耳其是该地区第一大国,但在2014年的研究中,伊朗已经取代了土耳其的位置

而排位第一（参见图 2）。2014 年的结果中，土耳其以 20% 比例位居伊朗之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2014 年土耳其将地区第一大国的位置拱手让给伊朗，但受访者还是把土耳其看作是地区大国，不过排名降至第二。与 2013 年相比，土耳其的地位有所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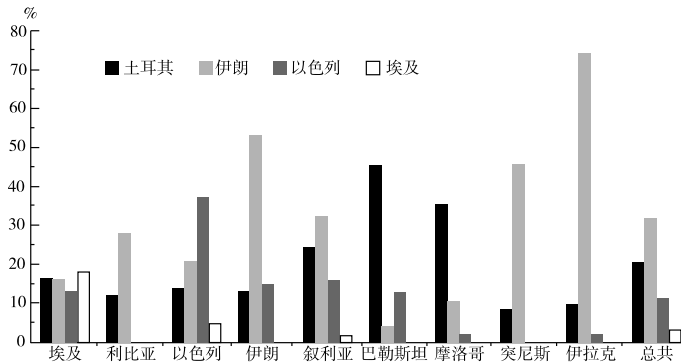


图 2 在中东地区哪个国家是地区大国

资料来源：How Middle Eastern Elites Perceiv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2014) .

但对“未来十年里在中东地区哪国会成为地区大国”的问题（参见图 3），36% 的受访者回答为土耳其。尽管这一问题回答者的比例从 2013 年的 60% 下降到 36%，但这依然表明中东“精英”对土耳其的未来抱有希望。如果土耳其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执行更灵活的对外政策，依然会为成为地区大国铺平道路。尤其是在同一个调查问题上，伊朗仅仅得到了 20% 的支持，这一点值得我们作更多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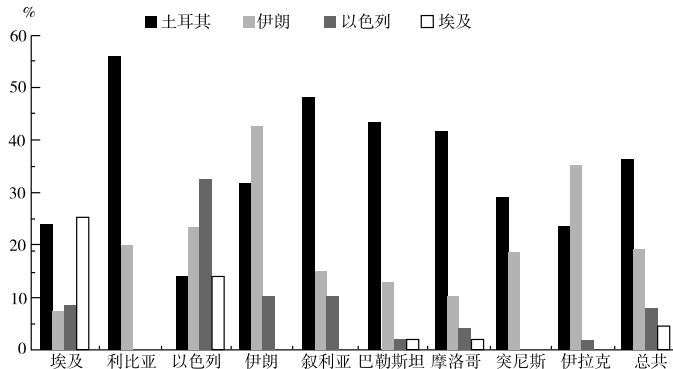


图 3 未来十年在中东地区哪国会成为地区大国？

资料来源：How Middle Eastern Elites Perceiv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2014) .

近年来,国际社会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土耳其是不是中东国家制度的现代榜样?在调查中,2013 年有 67% 的肯定回答比率;但是到了 2014 年,这一比率则降至 60.9%。因而,对于这一问题,即调查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土耳其仍然被中东受访者们认为是“模式国家”;第二,即便在中东地区整体环境的民主标准很低、安全问题严重的大环境下,中东国家将土耳其看作“模式国家”的意向还是有明显的下降。与 2013 年的调查相比,虽然土耳其的“模式国家”地位有下降,但是土耳其凭借其民主制度,并不妨碍其继续成为中东精英所关注的“模式国家”。

作为具有穆斯林背景的政党,正发党扮演了土耳其民主化的领导角色。它在对外关系上宣称土耳其是现代主权国家,对内却违背“哥本哈根标准”^①,将国家的情报局置于自身系统的中心,使得国家与腐败问题、独裁问题愈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土耳其政府的腐化反过来也成为“民主化”与伊斯兰无法共生的证据。笔者认为,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中最民主、最世俗化的国家之一,但在这样的国家里,一旦带有伊斯兰背景的政党执政,就会使其中的民主成分逐渐被抵消,最后带领土耳其一步步走向独裁国家,这就给始自 2010 年底以来处于“阿拉伯觉醒”运动中的国家留下了负面印象。埃及发生政变的时候,得到了来自中东和地区外的大量支持,其中的一个源头可能就是来自土耳其的有伊斯兰背景的寡头集团。然而,此举对埃及乃至整个地区的战略太过于积极,导致地区内外的国家想要极力避免使埃及成为下一个土耳其。

(三) 土耳其是否支持边缘化的组织?

在“伊斯兰国”(ISIS)出现后,西方国家与中东国家都认为,土耳其支持或默许“伊斯兰国”的发展。针对中东精英提出的一个调查问题是:“你认为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内是否支持边缘化的组织^②”(参见图 4),有 25.20% 的

^① “哥本哈根标准”是用来衡量一国是否有资格加入欧盟的一系列标准。它是由欧洲理事会于 1993 年 6 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制定的。如某国家要加入欧盟,必须达到哥本哈根标准所要求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政治方面,它主要要求候选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尊重人权、法制和保护种族少数、宗教少数、人数的少数;经济方面,它要求候选国真正地实行市场经济;法律方面,则要求候选国接受欧盟法系中的公共法、规则和政策。

^② 本文所指的“边缘化组织”是“阿拉伯觉醒”后在中东出现的不同的极端组织,尤其是在叙利亚内战打着反对巴沙尔政府旗号出现而后来走向极端的一些组织。

受访者回答了“是”，43%回答了“不是”，22.6%选择了“无力判断”，9%则选择“不愿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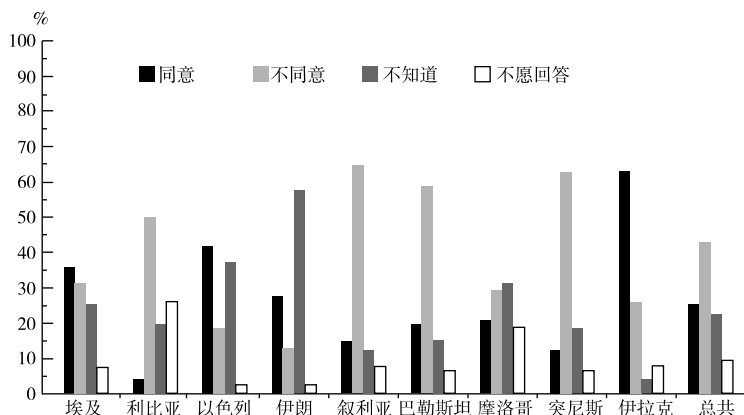


图4 土耳其是否在叙利亚支持极端组织？

资料来源：How Middle Eastern Elites Perceiv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2014) .

如果土耳其政府主张无需对比就足以认定“伊斯兰国”为恐怖组织，那么，它在类似问题上的态度也应当有相应的转变。在这些改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重新思考其境内的库尔德问题。土耳其既然在伊拉克问题上承认库尔德自治区，那么在叙利亚问题上也应该做好准备，因为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库尔德人在叙利亚试图建立自治区，无论叙利亚的政治体制是联邦制还是邦联形式，都需要与叙利亚的政治体制相匹配，这一点对于地区的和平是不可或缺的。在伊拉克问题上，土耳其出于对自身分裂的担忧，支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但对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来说，则必须用及早和灵活的方式来对待。叙利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土耳其政府没有像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那样较早地与当地库尔德人取得联系，基于巴尔扎尼（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和安卡拉政府在态度上的原因，该地区的控制权完全被民主统一党（PYD）掌握。如果土耳其在国内与库尔德人达成和平协议，并且库尔德工人党效仿西方国家范例（例如爱尔兰共和军），愿意放下武器，通过谈判的方式与土耳其实现政治一体化，则叙利亚库尔德人即便被民主统一党控制，也不足以被视为大的问题。但实际的情况并没有设想中乐观，安卡拉政府必

须全面分析库尔德问题；而且，当提及科巴尼与迪亚巴克尔关系^①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多角度思考，因为其中的问题极其复杂。

如果说“伊斯兰国”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小的灾难，那么该问题对土耳其而言，则可能如同世界末日一般。当美国在远离其领土的地方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土耳其却在面对国内叙利亚难民和“伊斯兰国”同情者的选择上难以判断。一旦发生战争，土耳其国内的叙利亚难民总数还将继续增加。已经接纳了约200万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如果不解决“伊斯兰国”问题，可能还会面临更多即将涌入土耳其的难民，而且在战争状态下，也无法将他们全部遣返回叙利亚。

（四）土耳其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扮演何种角色？

针对中东地区最热议的叙利亚问题，即前文提到的“土耳其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应该扮演怎样角色”这一问题（参见图5），65%的中东精英建议“叙利亚应先实现停火并通过回到谈判桌解决叙利亚问题”；同时，35%的中东精英坚定支持叙利亚反对派，25%的人则认为安卡拉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保持中立；只有10%的人要求土耳其政府支持巴沙尔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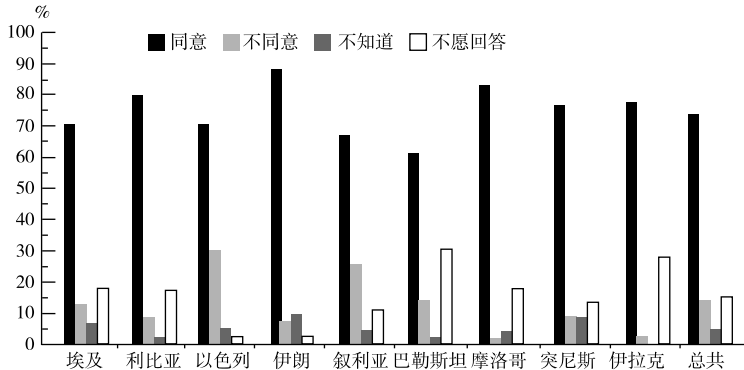


图5 土耳其解决叙利亚问题是否需采用停火和谈判方式？

资料来源：How Middle Eastern Elites Perceiv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2014)。

^① 科巴尼是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城镇。该地方的主要人口是库尔德人。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叙利亚政府于2012年7月撤出，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人民保卫军（YPG）占领该地。此后，科巴尼由库尔德人控制。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进攻该城市，当地约20万居民逃往土耳其。当时，以库尔德人为主人口的土耳其迪亚巴克尔城市的人民游行要求土耳其政府帮助该地区的库尔德人。土耳其政府对该问题没有很快做出反应，但2014年9月20日土耳其外交部长表示土耳其政府将允许伊拉克库尔德战士过境增援科巴尼库尔德人。

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一直被孤立，它与卡塔尔所进行的联合给叙利亚带来民主的承诺也是无法实现的，但安卡拉政府不愿直面这一现实。叙利亚自由军在短时间内一度被政府军压制，不仅由此产生了大量难民，也随之带来了“伊斯兰国”问题。当时，既然巴沙尔没有被赶下台，土耳其政府为何不能支持以双方停火并进行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如果两年前成功运作了这种解决方案，那么“伊斯兰国”也就不可能成为如现在一般的重要地区角色了。恰恰相反，这个机会已经被错过了。为了国内和平而选择与恐怖分子谈判的土耳其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却坚持将巴沙尔视为杀人犯而拒绝与之和谈。现在，为了解决“伊斯兰国”的问题，土耳其政府可能仍然需要承认巴沙尔政权并与其实现停火。在此之前，美国在袭击位于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基地时，都曾知会大马士革政府。这就表明，美国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承认巴沙尔的地位。

（五）土耳其与埃及外交关系走向

关于“埃及发生政权更迭以后，安卡拉政府与开罗政府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发展关系”这道题的回答中（参见图6），33.4%的中东精英都建议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1%的受访者则建议两国应像合作伙伴一样开展关系，所以总的来说，有高达44.4%的受访者都认为两国应该拥有正常关系，甚至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此外，有23.5%的受访者选择“土耳其政府应当与埃及的塞西政府保持距离”，还有15.2%的受访者认为“安卡拉政府应当冻结与开罗政府之间的联系”。当然，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伊斯兰国”袭击土耳其驻摩苏尔领事馆事件^①，发生在本次调查完全结束之后。

（六）“阿拉伯觉醒”后的“新中东”是否实现了民主化目标？

2014年本次调查新增了一个问题，即“阿拉伯觉醒是否达到了预期愿望与目标”（参见图7）。对于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所有问题中最明确、也是得到否定最多的一个。86.7%的受访者认为，以民主化和自由化为名义的“阿拉伯觉醒”已经失败了，而认为“阿拉伯觉醒”获得成功的比例却只有可怜的6%。

^① 该事件是指在2014年6月11日，土耳其驻伊拉克摩苏尔领事馆被90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包括领事在内的49名外交人员被绑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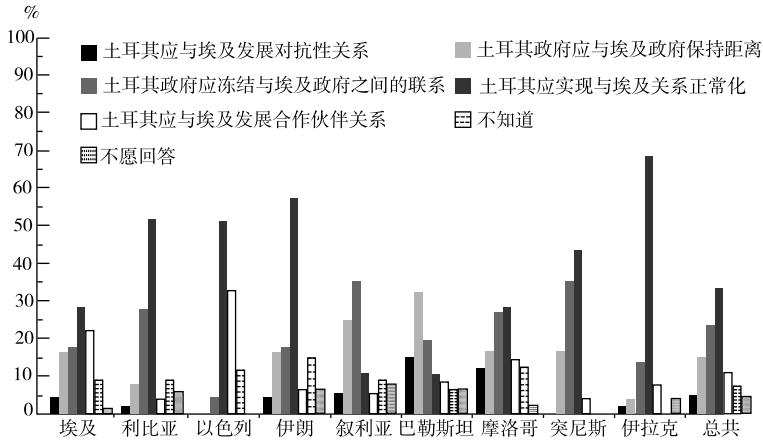


图6 土耳其政府与埃及政权更迭后的塞西政府应在何种程度上发展关系？

资料来源：How Middle Eastern Elites Perceiv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201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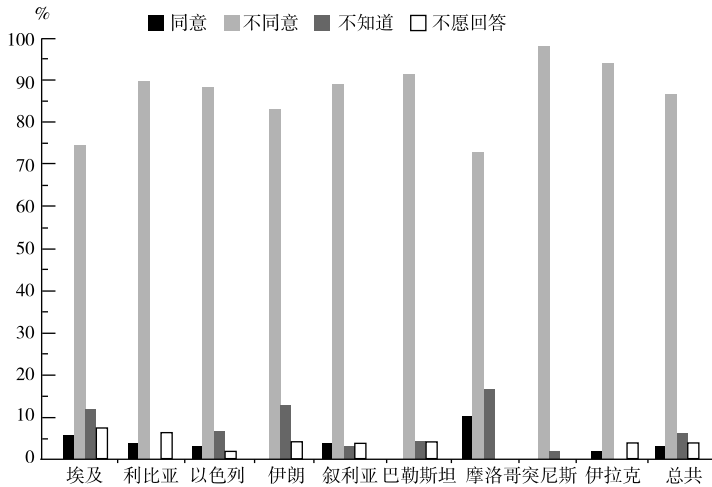


图7 “阿拉伯觉醒”是否达到了民主化的预期愿望与目标？

资料来源：How Middle Eastern Elites Perceiv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2014) .

对于“阿拉伯觉醒”失败原因的总结，有40%的受访者认为首要原因是地区内没有足够的民主文化基础，还有35%的人选择了另一个原因，即地区大国对“阿拉伯觉醒”没有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且也没有充分的经济资源保证民主化的推动。另外，33%的人认为派别冲突是使“阿拉伯觉醒”中止

的一个重要原因；25%的受访者将“阿拉伯觉醒”的失败归咎于其所涉及国家中的独裁者及其支持者对该运动进行的抵制。相应地，面对“以失败而告终的‘阿拉伯觉醒’中，哪些国家的决策是积极的”这一问题，土耳其、伊朗、卡塔尔得到了几乎相同的25%的选择，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力则相对于以上三国要小得多。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依照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进行划分并在1918年基本成型的中东地区，随着“阿拉伯觉醒”而进行的尝试，得到了不如预期的结果和经验。“潘多拉魔盒”就此被打开，已经没有办法再将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恢复到原来以西方为中心的独裁制度，也没有办法建立民主和多方参与的政治制度。在中东地区所存在的景象，在政治学中只有一个称谓，即“混乱”。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已经不存在一个有强大控制力的政府，突尼斯仍在试图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基地”组织、努斯拉(AI-Nusra)、“伊斯兰国”这些恐怖组织，都在试图成为“新中东”不可忽略的参与者。此时此刻，中东研究专家已经无法预见地区的未来走势；相反，现在是属于占卜师的时间。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除了预测未来的苦难，其他具体的事务都很难预料。

经历了“阿拉伯觉醒”后的“新中东”，民族国家的边界已经失去了意义。现在，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派别都在共享同一个国家。但由于这些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国家这个概念也逐渐失去了其本来意义。当下，这个问题日益严重，同时也愈发深刻。以前在地区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巴勒斯坦问题，似乎也失去了其重要性。一个世纪前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带来的秩序正在告别历史，却没有新的秩序替代它的位置。

中东地区频繁发生的冲突，已经使该地区疲于应对，此时需要在该地区出现更多的国家间合作，以实现平衡。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阿拉伯觉醒”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以推翻权威政府为出发点的行为者，在当前这一阶段是失败的；即便它们恢复到原点，也需要很多年时间。通过过去4年多的事实，我们可以觉察到，在中东地区什么是不应该发生的。没有民主文化、多元化、不同媒体和个人自由保护的中东地区，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民主制度，甚至还无法面对混合的民主制度。3年前，把民主制度解释为投票箱的国家，在经过了“阿拉伯觉醒”的教训后，将民主化的标准重新定义为：在有安全、有经济发展和有未来的国家生活。

土耳其在这些失败的场景中，由于对外政策的选择和国内独裁化的行为，在“阿拉伯觉醒”中也承受了相应的损失。首先，安卡拉政府没有解决库尔德问题。其次，它们也没有满足阿拉维派（Alevi）^①的要求，而是继续制造社会的对立，也就无法实现使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模板国家的主张。土耳其无法脱离在该地区发生的派别和民族冲突，因此在国内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相当稳定与和平的社会，这可能是土耳其实现大国目标的第一步。土耳其的经济主要依靠出口和旅游，也就意味着土耳其的经济依赖于整个地区的稳定，因此土耳其没有绝对的机会与能源大国或有影响力的国家（如伊朗）进行全面的竞争。安卡拉政府无论是在内政方面实行减少社会对立的政策，还是在对外关系上重新定位其首要目标，都需要再次回归原定的加入欧盟的条件中，这也许是土耳其在中东地区令人崩溃的冒险隧道前的最后一个出口。

结 语

通过对上述调查结果进行总体评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如果土耳其继续保持比其他中东国家更民主、更稳定的状态，那么它将是中东地区的重要角色。然而，一旦土耳其出现走向独裁的迹象，将会导致土耳其失去其所获得的收益（收益指的是民主、经济发展、地区大国身份等）。中东地区精英期许的土耳其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土耳其，而不是制造问题的土耳其。虽然在 2014 年的调查中，中东精英仍然保持了对土耳其较高水平的评价，但是与 2013 年的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东精英对土耳其的好感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有下行的变化。考虑到 2013 年中东国家在民主、自由、安全等方面的退步，我们可以认为中东地区精英对土耳其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原有水平。但是，在地区政策方面，如果与伊朗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伊朗在地区层面日益崛起，而土耳其却在明显地退步，尤其考虑到土耳其的地区政策是无法选择和不可持续的，这就使得本项研究的结论尤为重要和突出。土耳其在与埃及的关系，以及对叙利亚问题的态度方面，我们可以从中东地区精英

^① 阿拉维派（Alevi）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独立教派，教徒主要分布于土耳其。目前，土耳其政府不承认阿拉维派的“组屋”为宗教场所。土耳其政府规定中小学校的穆斯林学生必须上宗教课，阿拉维派抱怨学校的强制性宗教课教授逊尼派教义，未有顾及阿拉维派。欧洲人权法庭在 2007 年判决土耳其需要修改学校宗教课程，加入对阿拉维派信仰的介绍。

在调查中的反映里，获取如何重新制定地区政策的线索。中东地区在社会不稳定、发生内战、政变和派别冲突等问题十分突出的这段时间，作为地区“模式国家”的土耳其失去的地位，以及与2013年相比退步的土耳其形象，对安卡拉政府而言都是应该严肃思考的一个问题。

未来十年里仍然被看作“模式国家”或地区大国的土耳其，如果能保持自身的稳定、民主和自由性，那么还有很大的机会影响中东精英。但是，假如土耳其像中东国家一样发生内部冲突，甚至都无法保持目前中东精英对土耳其的好感。

2011至2014年，众多中东专家伴随着“阿拉伯觉醒”的激动所判断和撰写的预测几乎都没有实现。在这些错误的预测当中，土耳其外交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政策上没有一个可选择的“B”计划，甚至提到“土耳其与哪一个中东国家关系比较好”的问题时候，都难以找到正确的答案。近年来，“阿拉伯觉醒”和地区其他的问题导致土耳其周边出现了不同的边缘化组织。在如此环境下，除了伊朗、希腊、保加利亚之外，其他国家要么有内战，要么有民族或派别冲突，要么有边界问题。对土耳其而言，目前的中东地区已经成了其失去的最大经济市场，该地区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在历史上也尚属首次。

今日的叙利亚，可能会成为总结未来中东形势的现实范例，而这幅景象对经济主要以出口和旅游为依托的土耳其而言是个“灾难”。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对外贸易规模已经缩小60%（2010至2014年），未来土耳其与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甚至伊朗，也都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如果这些双边关系带来的问题，再加上由于地区发生的冲突对土耳其旅游业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使土耳其经济陷入僵局。

原本在地区问题上设想建立奥斯曼联邦的安卡拉政府，现在连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政策都很难执行，而与安卡拉政府维持了较好关系的国家，其数字甚至不会超过5个。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正发党政府对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对外政策不会发生变化。把“阿拉伯觉醒”解读为革命的“正发党化”的正发党政府，对民主和普世价值观与地区的融合产生了负面影响。正发党主张用特定价值观解读“阿拉伯觉醒”的过程，但现在看来，正发党很明显是误读了埃及和叙利亚人民的选择。

虽然在中东地区，叙利亚问题是正发党对外政策进入的一条绝路，但实

际上其崩溃的原因是土耳其外交的身份问题和决策者的优先事项问题。在“阿拉伯觉醒”之前，安卡拉政府实行比较平衡的现实政治，随着阿拉伯人民开始暴动，它却失去了理智，从此与传统的同盟分离，并开始制定超出自身能力的对外目标，甚至对外部世界多次宣示自己的霸权选择^①。正发党通过与自身接近的代理人，试图控制地区所发生的变化，并且试图以秩序建立者的身份，主张引导和治理这一过程，该愿望使得世界大国和发生变化的国家对土耳其产生担忧。

土耳其对“伊斯兰国”政策中所提到“宝贵的孤独”（Precious Loneliness）理论^②，也不能解释其所面对的无可选择的情况。当中东地区形势发生变化时，土耳其与地区内国家试图签订数量庞大的合约，如今却只能在地缘政治优势带来的机会框架内进行合作。5年前被选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土耳其，最新一次的得票数仅是5年前得票数的30%。安卡拉政府日益失去的同情与同盟，已经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土耳其在外交上已经没有具体行动的空间，安卡拉政府在外交上所再次倡导的加入欧盟的意图，想要像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候选国那样“令人鼓舞”，也是不可实现的目标。由于土耳其政府的互联网禁令、把司法置于法务部之下、限制媒体自由、滋生腐败、禁止经济市场竞争力的行为，以及考虑到欧盟报告中有关土耳其的悲观看法，安卡拉政府在外交上倡导的加入欧盟计划也是完全不现实的。在内政与外交上表现出的不一致性，使得土耳其成为一个不可预见的国家。

很多民主的发达国家出于对“伊斯兰国”、乌克兰、伊拉克和叙利亚问题的担心，考虑到土耳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由此而来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才不得不与土耳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关系。除了这些必要的关系，安卡拉在外

^① Savas Genc, “How do Middle Eastern Elites Perceiv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https://www.academia.edu/3819983/How_do_Middle_Eastern_Elites_Perceive_Turkish_Foreign_Policy, 2014-04-25.

^② 2013年，曾担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外交高级顾问的易卜拉欣·卡利姆针对土耳其国内学术界“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日益孤独，没有关系好的国家”这一评价所提出的理论。“宝贵的孤独”指的是十年前的土耳其和现在的土耳其之间有明显的变化，十年前土耳其在国际政治或在中东地区没有太多的话语权，甚至世界其他国家十年前也不太关注土耳其对国际政治和中东地区的话语和政策。根据卡利姆的解释，今天土耳其因为它所执行的对外政策正确，而受到其他国家的排外（从国际政治和中东地区上的排外），那么这不是意味着土耳其的孤独，更意味着土耳其表现出有尊严的姿态，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非要用‘孤独’一词，那么应该把该情况解释为‘宝贵的孤独’。世界各国对叙利亚、埃及等问题保持沉默的时候，土耳其就不沉默而站在正确方向。因此，这就是给土耳其带来‘宝贵的孤独’的原因。”

交上没有其他可以行动的空间。土耳其现在的景象就像冷战时期因地理优势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一样，也没有为另一选择所做的准备和努力。土耳其外交需要新的观念：为了打开新的外交空间，首先应该向全世界重新展示出土耳其是一个可预见的和可靠的民主国家；否则，离开民主和自由的土耳其，无法实现在全球层面上的吸引力。形象地说，目前的土耳其正穿着以地缘政治布料做的“紧身衣”，却试图在一个顶级舞会上翩翩起舞；然而，现实景象比想象中的还要悲惨。

How Middle Eastern Elites Perceiv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ey] Savas Genc & [Turkey] Fatih Agil

Abstract: In 2014, researchers from Fatih University made a survey named “the Perception regarding Turkey by the Middle Eastern Elites” in nine countries from the region. Elites like politicians, academicians, journalist, businessmen and writers from the Middle East were mainly targeted by the survey. With regards to “Perception o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ost respondents held following views. Turkey’s foreign policy seemed exceed its capability especially after the so – called Arab revolutions. Moreover despite Turkey is still being regarded as a regional power her reputation started declining to some extend. At the same time Turkey is not being supportive on the Islamist extremism in the region. Meanwhile, Turkey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mediator in the Syrian crisis and Turkey should cooperate with Egypt after its changes as well. Based on Turkey’s recent diplomatic setbacks in the region, the Turkish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a new diplomatic understanding and adjust her foreign policy in order to expand her diplomatic space.

Key Words: Public Opinion; “Arab Awakening”; Turkey;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Elites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